

国际共运史研究

1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苏彦斌

国际共运史研究

GUOJI GONGYUNSHI YANJIU

第一辑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203,000 字
1987 年 4 月第 1 版 198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200

书号 11001·757 定价 1.80 元



编辑说明

《国际共运史研究》是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主办的学术丛刊。原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0年创刊，只限国内发行，到1986年底共出18辑和《卢森堡专辑》、《布哈林专辑》。1987年起改名，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本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执行双百方针，交流不同观点，互相切磋，以期对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起一些推动作用。本刊力求反映我国共运史学界研究的最新水平，提供国外研究的重要信息和珍贵资料。

本刊设《专题论文》、《人物传记》、《国际共运与中国》、《文献和资料》、《国外书摘》、《外论选译》、《名词和典故》、《学术动态》、《国外研究机构介绍》等专栏。热忱地欢迎国际共运史学界和邻近学科对国际共运史研究感兴趣的人士踊跃投稿。

本刊发表的文章不代表编辑部的观点，文责由作者自负。

本刊每年出三辑，于2月、6月、10月出版，每辑约20万字。

《国际共运史研究》编辑委员会

1987年2月

《国际共运史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李宗禹

副主编 宋洪训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庸安 李兴耕 张文焕

胡文建 殷叙彝(本辑责任编辑)

本辑技术规格工作由费新录负责

Studies of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No. 1

CONTENTS

Forum, Scope and Methodology of the Studies of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Zhao Baoxu, Xu Kecheng, Wu Yaohwei,

Wang Fuchun, Yin Xuyi

On the two Tactical Turning-poi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Song Hongxun

The Spanish War (1936—1939) and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Yang Yanjun

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Tactics of the Indian Communist
Party and Comintern towards the Indian

Bourgeoisie (1920—1934)

Song Xinning

The Swedish Social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Functional
Socialism"

He Shita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of the
League of Communists of Yugoslavia

Huang Zhonglian, Yie Zhicheng

On the Political Neutralism of the German Trade Unions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Zhao Yongqing

**A Friend of the Chinese People—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Ernst Thalmann's Birthday**

Liang, Jianhua

Leon Blum, a Biographical Sketch

Li Xinggeng

The Repercussions of the Spanish Anti-fascist War in China

Zhang Shipeng, He Xing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Memoirs, Book Digests, Symposium-
reports etc**

国际共运史研究

第一辑 目 录

笔谈：国际共运史研究的范围和方法

发挥自己优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共运史学赵宝煦(1)

把体制改革史的研究再深入一步许可成(6)

要重视对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

和党派的研究吴耀辉(10)

从方法论看共运史和政治学之间的联系王福春(14)

略谈国际共运史的研究范围、学科性质和

现实意义殷叙彝(18)

共产国际历史上的两次策略转变宋洪训(26)

西班牙战争与共产国际杨彦君(45)

试论印度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待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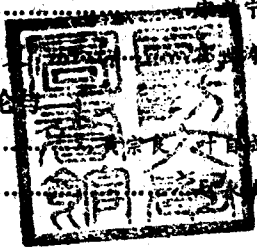
阶级的策略(1920—1934)李 宁(63)

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和“职能社会主 (80)

南共联盟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理论

实践 (97)

论德国的工会中立 (110)



纪念恩斯特·台尔曼诞辰一百周年

中国革命和工人阶级的任务.....〔德〕恩斯特·台尔曼著(130)

梁建华译

台尔曼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梁建华(137)

人物传记

莱昂·勃鲁姆.....李兴耕(142)

国际共运与中国

1936—1939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

与中国人民的斗争.....张世鹏 霍 兴(157)

文献和资料

共产国际关于西班牙战争的若干重要

文件.....杨彦君编译(173)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

讨论西班牙问题时的发言(1936年9月18日).....(173)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

西班牙问题的决议(1936年9月19日).....(175)

斯大林等人致西班牙共和国总理卡瓦列罗

的信(1936年12月21日).....(176)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工作

的决定(1936年12月27日).....(178)

陶里亚蒂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8月30日).....(183)

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法共就帮助西班牙人民

的问题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的信(1937年3月9日).....(189)

- 季米特洛夫给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
拉蒙·莱蒙尼达、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何塞·迪亚斯、西班牙总工会代理总书记
费利普·普雷特尔的复电(1937年6月3日).....(190)
- 季米特洛夫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主席
德·布鲁凯尔的电报(1937年6月3日,发往布鲁塞尔).....(191)
- 季米特洛夫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主席
德·布鲁凯尔的电报(1937年6月8日,发往布鲁塞尔).....(191)
- 季米特洛夫给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
拉蒙·莱蒙尼达、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何塞·迪亚斯、西班牙总工会代理书记
费利普·普雷特尔的电报(1937年6月8日,发往瓦伦西亚).....(193)
- 季米特洛夫给德·布鲁凯尔的复电(1937年6月15日).....(194)

国外书摘

- 一部研究印共(马)的专著.....陈峰君(195)
- 《印共(马)——诺言、前景、问题》介绍

名词和典故

- “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词源
考证.....[法]加布里埃尔·杰维尔著(208)
- 承 中译

工具书介绍

- 工人运动史辞典类工具书评介.....[波]费利克斯·梯希著(221)
- 王学东编译

国际学术会议

关于奥托·鲍威尔的一次学术会议和论文选集:

《奥托·鲍威尔——理论和政策》周悉庸(235)

民主德国学者论西欧社会民主党在政治

和思想方面的新动向李长山(245)

——一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介绍

国外研究机构

社会史国际研究所老图书馆员

谢尔特马夫人的回忆录梁明摘译(252)

国际共运史研究的范围和方法

赵宝煦(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发挥自己优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国际共运史学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科学领域作过重要而且相当有成就的探索，但是，有较多的中国学者在这方面从事系统的研究工作还是近二、三十年以来的事。时间虽然不长，工作却是有成绩的。特别是近几年来，有一定质量的共运史专著陆续出版，在例如布哈林、卢森堡、普列汉诺夫以及苏联新经济政策和三个国际等等问题上，不断出现有若干突破的新成果，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事。

今后，为了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工作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我认为应该考虑更多地发挥当前中国的优势。下面的想法很不成熟，提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当前，我们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其他社会科学也一样)，一定要注意发挥我国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所未有的优势，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提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等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

精神。

我们当然强调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但标榜马克思主义的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确有真假之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正确，就因为它是科学。但一旦把它当作教条并达到僵化的程度时，它就背离了科学性的要求，从而也就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实事求是，就是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恢复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要求。

我把强调实事求是精神看作当前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实际上远不限于这一学科）的一种优势，是因为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不良学风，半个世纪以来，已经在国际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造成一定污染。1978年，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那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论战，应该说是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作风，向足以致马克思主义于死命的各种形形色色的“凡是派”举起投枪。因此，我认为这确实是我国当前在科学研究工作指导思想上的—种优势，我们应该注意很好地发挥这种优势。

但是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工作中认真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却还不能掉以轻心。应该估计到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存在着许多先天的和后天的不利条件。

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科学，所以存在着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矛盾问题。从理论上说，二者本应没有矛盾。但实际上，对它的科学性要求往往屈从于政治性要求，即为了当前的政治需要而不惜削弱或完全抛弃其科学性。其实，削弱或完全抛弃了科学性的科研成果，只能是半科学或伪科学。以半科学或伪科学来为现实政治服务，只能起反效果，只能帮倒忙。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广泛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工作时，正当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可以说，它是孕育、生长在一个日渐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中。因此，从一开始，对它的政治性要求就大大侵犯了对它的科学性要求。

第二，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相当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工作者都可以说是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范本而迈开第一步的。作为一本广泛流传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人所共知，它是瑕瑜互见，功过并存的。一方面，它曾在世界范围内通俗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一方面，它又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不科学的方法论。而以此书作为科学研究的范本，自然害多利少。因为它既善于把多姿多彩的群众斗争历史塞入主观的逻辑框架，又惯于把生动活泼的理论原则捏成死板的教条。有时它甚至不惜以剪裁史实的手法来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关于这本书，我国学者已在进行再评价，这里无须多说。问题是，我们应该时刻警惕它先入为主地可能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三，过去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我们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工作的资料往往是第二手的，往往是别人嚼过的馍。经过别人筛选、根据别人的政治需要而加以取舍后提出的资料，自然会大大影响我们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同时，因为是第二手材料，所以就还有一个译文是否准确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要使用第一手材料，就需要刻苦学习，掌握原材料的语种。对于年青一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工作者来说，要求他们认真学好外文，至少要能读懂两种外文的资料，应该不是过高的要求。

第四，还有一个习惯上的“随风转”问题，应该注意克服。过去在极左思潮控制下，社会科学工作者随风转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今天情况变了，但我们却还需要警惕随风转的惯性后遗症。过去对历史人物的不公正评价，该翻案的当然应该翻案。但也不要以翻案为时髦，对历史上否定的人物都要大作翻案文章。研究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也没有必要争着从旧书古籍中寻章摘句，把传播时间说得越早越好。

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科学，因此更应对其科学性有严格的要求。我们若想在这门学科的研究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首先应该发挥当前我们在指导思想上的优势，在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认真严谨的科学分析研究。对毛泽东同志不能“两个凡是”，对马恩列斯同样也不能“两个凡是”。我们是科学工作者，既不是现成历史结论的辩护士，也不要满足于作一个经典作家语录的阐释人。

其次，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范围来说，我们要想打开局面，闯出新路，也必须发展中国自己的优势，注意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一百多年来，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从任何角度说，都不能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们过多强调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的分工。其实，对中共党史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不能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而孤立地求得科学认识。令人高兴的是，目前已有中共党史学者注意到二者的联系，从而在这两门学科的交界点、边缘处作文章，并提出了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占有大量的任何外国人都很难掌握的第一手材料。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当然，我不是要以中共党史的研究代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我认为我们应从二者的联系上选择课题。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中国革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作比较研究。夺取政权前的主客观条件、战略策略问题可以比较，夺取政权后在政权建设方面，在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过

程方面等等,都可以而且需要作比较研究,从而总结出必要的经验教训。又如文化大革命问题,它既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场空前浩劫,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严重挫折。它的产生,固然有中国本身的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深刻根源,同时也存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背景的冲击作用。就文化大革命的表现形式来看,你可以认为是中国人在发疯。但十年浩劫中的许多行动,实际上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缺点和错误紧密相联。象这样重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课题,我们中国学者掌握着最全面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我们之中绝大部分人都是亲身经历者,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更重要的是,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又有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文件作为依据,因此研究这个问题的绝对优势当然在我们手中,但是至今我们还没有拿出象样的科研成果。相反,在国外,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论文和专著却多如过江之鲫,大部头的著作也屡见不鲜。当然,他们的立场观点大都和我们不同,而且他们的态度往往不够严肃审慎,而我们却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科学态度来从事这一工作。这可以说是我们迄今还拿不出有份量的著作的原因之一。但是,题材太敏感,心有余悸的学者视为禁区,也是一个原因。此外,也有人认为一般学者看不到有关的机要档案,所以无法研究。其实,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材料,绝大部分都是公开的。某些具体的历史细节我们弄不清楚,也无关宏旨。文化大革命这一科研课题,涉及各个学科领域,它具有许多层面。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课题,应该是宏观与微观结合,并且要更多地从宏观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例如可以从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中苏论战这个大的国际背景着手,探寻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根源,同时,也要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局所产生的重大震撼和深刻影响等等。

以上只是举例。目的是说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范

围方面，要注意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敢于多方开拓，闯出新路。

当着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纪念之际，我们要准备迎接一个社会主义学术繁荣的黄金时代。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开展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工作的学者们，就是从事上述宏伟工程的一支重要部队。我们相信这支队伍一定能够不断拿出具有世界水平的，第一流的科研成果来。

许可成(天津师范大学政教系)

把体制改革史的研究再深入一步

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的历史应该纳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体系，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在共运史工作者中大概不再有人怀疑了。尽管许多人早已认为，共运史研究的重点应该逐步转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当代，要抓住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到多国的特点，研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道路的发展变迁，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改革在共运史中是不能占一席之地的。只是在破除了统治共运多年的那种对体制改革的不承认主义之后，对改革横施攻击的“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泛滥”等等不实之词遭到了唾弃，人们才能理直气壮地承认改革本是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正是共运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于是一些共运史工作者着手研究体制改革，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开始发表，有的共运史著作也增添了关于改革的章节。这样，关于当代共运的论述，才算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实际，因而把这个学科的研究水平向

前推进了一步。这无疑是我国共运史学史上一件值得注意的、可喜的大事。

但是，我们决不能到此止步，还需要继续前进，不能满足于只是在一部共运史著作中，把哪个国家某年某月曾经进行过什么样的体制改革，作为孤立的历史事件，客观地加以介绍。尽管比起根本不介绍，甚至加以批判来，这确是前进了，然而显然还是非常不够的。因为这并不能真正体现体制改革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全部意义，因而也不能在共运史研究中带来根本性的突破。

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试想在一部著作中，一面介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体制改革的情况，并声称这是必要的，一面又在大肆宣扬那种传统僵化模式具有多么大的威力与成就，却讳言这种模式的弊端，那么改革究竟是为了什么，岂不令人感到茫然吗？或者还在鼓吹社会主义国家有多少条共同规律必须遵守，实际上还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有一种大一统的模式，这怎么能和改革的主张对得上号呢？我看，这样的论述实际上已经陷入了难于自圆其说的窘境。共运史研究当然不能在理论上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

那么出路何在呢？国际共运史作为一门科学，自有其独立的体系，也可以套用流行术语，说它是一个理论系统。任何一个理论系统内部是容不得一点逻辑矛盾的。如果真正要做社会主义改革的促进派，那么不仅要研究已有的一些改革，反映这些改革，而且还必须把改革的精神贯彻到底，贯穿于共运史整个体系中。出路就在这里，就在于把关于改革史的研究更向前推进一步。或许这正是当今共运史工作者面临的共同任务。

具体说来，这实际上是要求明确树立一个观念，然后把它运用到共运史研究中去。这个观念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改革是当代共运发展的历史潮流。运用到研究中，就要求把改革看